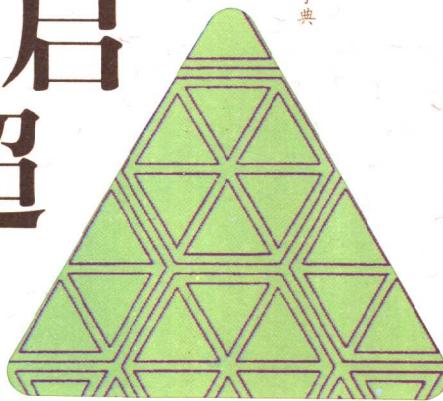


王蘧常选注

老年人如僧 少年人如侠 老年人如字典  
少年人如戏文 老年人如鸦片烟  
少年人如波兰地酒 梁启超曰  
人固有之 国亦宜然

# 梁启超

选集



近代文学 名家诗文选刊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梁启超选集

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

王蘧常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启超选集/梁启超著；王蘧常选注 .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

(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

ISBN 7 - 02 - 003387 - 3

I . 梁… II . ①梁… ②王… III . ①梁启超 - 选集  
②诗文 - 作品选集 - 中国 - 近代 IV . I21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0304 号

责任编辑：宋 红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校对：宋 红 责任印制：周小滨

梁启超选集

Liang Qi Chao Xuan Ji

王蘧常 选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8 千字 开本 88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5 插页 2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7 - 02 - 003387 - 3 / I · 2588

定价 30.00 元

# 隔着新世纪的门槛往回看

——写在“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前面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建设、发展，从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带着难以忘却的创痛、带着取得成就的喜悦、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走进了二十一世纪。

一百年前，二十世纪之初的 1900 年，英、法、德、意、美、俄、日、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烧、杀、抢、掠。一百年后，二十一世纪之初的 2001 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在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的今天，在中国人已经站起来和正在富起来的今天，做一番百年回首，看看蹒跚于二十世纪之门的中国，无疑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之前，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先给中国人送来了资本主义。当大清国那一直闭锁的破败国门被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轰开之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并为现代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所震惊。意识到：此夷狄非彼夷狄，“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财利，其隐赈流溢

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亲见而信之矣，又莫测其所以然”（严复《原强》，《选集》第25页、31页）。于是，“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洋和学习西洋成功维新变法的东洋，希望从那里找到变法图强的良方，因为当时的局面正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所说：

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  
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  
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  
骤之。

然而东西方社会、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使“拿来”也变得不是那么唾手可得。正如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以至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同上文）的情况。由此可以想见，东西方文化间的交融是怎样一种化合的过程。当时的“体用之辩”，即具体反映了两种文化的碰撞。而当新科学、新学科引进中国之后，则大大激发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思想界之活跃，实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声。

在火光血影中写成的中国近代文学，记录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解体和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蜕变的阵痛；记录了一百年前中国人艰难跨入二十世纪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中国人为民族前途和命运所做出的探索和牺牲。感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民族的神经，往往能提前感知时代的风云际

会。而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则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优良传统。已经站起来和正在富起来的中华民族，到了该让自己“硬”起来、“强”起来的时候了。回顾一百年前中国人的强国之梦，做一番抚今追昔的反思，便是我们编辑“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的初衷。

丛书原拟为十种，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定为目前的七种，一次推出。即：

- 《龚自珍选集》(孙钦善选注)
- 《康有为选集》(舒芜、陈迹冬、王利器选注)
- 《梁启超选集》(王蘧常选注)
- 《严复选集》(周振甫选注)
- 《林则徐选集》(杨国桢选注)
- 《翁同龢选集》(马卫中、张修龄选注)
- 《秋瑾选集》(郭延礼选注)

其中前四种为我社原有出版物的改版重排，后三种为新书。

所以使用重排本，以其为之做注者都是学界知名人士，可以说是“名家”注“名家”。虽注释体例有不尽规范之处，所下断语亦难免带有时代烙印，然释作品背景之周详、注历史典事之精到，则是后来人很难逾越的。加之选注工作被当今学界视为小道，或根本不算科研成果；或在计算成果时大打折扣，致使当今要找到笔下“应有尽有”和“应无尽无”的新注家非常不易。

重排中，我们对旧注本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一、删除“落后”、“反动”等游离于正文之外的空泛政治性结论；二、改正个别不确切的僻字注音和语词注义；三、改正注释中的引文差误；四、

改正原书排校错误；五、与新注本求得大致相同的体例。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旧注本的以下两种情况未做处理：一、征引史料多为概述，虽加引号，但并非严格引文者，如《梁启超选集》即属此类情况；二、对所注出典有不同见解者，如《严复选集·三月三日……游万生园》：“何曾三起继三眠，却笑万生成万死。”注[11]曰：“三起三眠：《三辅故事》：‘汉苑有柳，状如人，号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细味之，三起三眠似当指蚕眠，而非柳眠，即《本草》所谓“蚕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也就是蚕由初生到成蛹的时间。若“一日”之内而“万生成万死”，何乃太速耶？然在做注者已归道山的情况下，此类问题不宜强加于人，故一仍其旧。

鉴于当今注释人才之难得，我们尤其应该感谢为丛书之新选题担当选注工作的几位先生，特别是杨国桢先生。为丛书做注时，杨先生的女儿病情危重；注稿完成之日，正女儿撒手尘寰之时。杨先生在《林则徐选集》的前言中表达了对女儿深深的歉疚和思念，于此我们亦向杨先生和他已故的女儿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请相信，一个青春女孩的生命正以书卷形式在我们中间延续着，我们希望杨先生因此而得到安慰。

有研究表明：1840年前后，中国在世界上还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英国，位居世界第二，远超德、法、俄等国。当年清军战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武器落后，并不是火炮射程够不着人家，也不是我们的军费投入不够。据史料记载，甲午海战时的北洋水师在舰船吨位、航速、火力等方面与日本海军或是相差无几，或是互有优劣。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

的优长，各装 12 英寸大炮 4 门，装甲厚度达 14 寸，堪称当时亚洲之最，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水平。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无如此规模的装甲防护。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我方均占优势，只有中口径火炮，日本稍稍领先。总起来看，双方实力大体相当，北洋水师并不比日本海军逊色。然而，北洋水师惨遭失败，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帆风顺！人们不禁要问：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一流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答案很清楚：战败的根本原因是清廷腐败无能，军队素质低下。这就是为什么英军拿不下一个小小的虎门炮台，却能让整个大清政府屈服的原因。如今，我们切不可忘记历史的惨痛教训。

中国人的强国梦做了一百年了，龚自珍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翁同龢说：“留取世间真道德，看人扼腕献奇方。”(《小游仙》)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秋瑾说：“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梁启超说：“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人固有之，国亦宜然。”(《少年中国说》)

与一百年前相比，我们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全没有理由悲观；但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人家却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与当年的那八个国家相比，我们更没有理由盲目乐观。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

百年来，国歌中的这句话其实不止一次在中国大地的上空响起。我们没有时间走弯路、更没有时间走回头路了！好在新中国的几代领导人给我们勾画了越来越明晰的发展蓝图，“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开除球籍”，“中国人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我们葆有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性格，不忘海纳百川、雍容大度的汉唐精神，“聚精会神地”搞建设、谋发展，中国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温故而知新，便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现代意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3.8.

## 前　　言

王蓮常

一九五八年，夏历为戊戌，上溯六十年前的戊戌（一八九八年）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戊戌变法运动的一年。变法开始到失败，仅仅只有一百零三天，好像满天乌云中的闪电一般，一瞥就消逝了。但是它的失败宣告了改良的道路走不通，接着闪电消逝之后，却是个响亮的焦雷，那就是对清王朝绝望了的全国人民，以革命的武装斗争直接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戊戌变法虽然必不可免地遭到了失败，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有进步的意义。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们，在揭露封建帝制的黑暗和帝国主义侵略的阴谋，启发社会公众（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觉悟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以前，清王朝的无能、腐朽、腌臜、罪恶……虽然已渐渐表面化，然而王朝的纸糊门面，还能欺骗一下人，吓唬一下人，到了这时，改良主义运动者，便能够在他们的认识限度之内，大声疾呼，予以系统的揭露。如：当时还粉饰太平，独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对某当权人物说：王朝“祸在眉睫”。（见康有为自订年谱。）当时封建政权的办事，一切取决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则例，以为是天经地义，不可以一些改变的，独梁启超对李鸿章说：“今败亡中国者，六部则例也，若不亟改，不能为治。”（见梁氏《戊戌政变纪事本末》。）当时靠八股取士，来麻醉人民，独他敢于对光绪帝载湉说：“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

之。……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当然，代清王朝推卸责任，是不应当的，但对于八股制度的攻击，在当时也可说是尽情了，毫无忌惮了。其他如七上载湉书，它的内容，大致都是暴露的，他在公车上书里说：“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盛暑已至，而不释重裘，病证之变，而犹用旧方，未有不喝死而重危者也。”又说：“陛下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不忍见煤山前事。”这些话，虽然是对封建统治者提出警告，希望他能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来消弭革命危机，但这样直率暴露，毕竟是难能可贵的，是有进步意义的。他们的暴露，不仅是对统治阶级，也面向社会公众，所以他们的暴露方式大约有三种：

- 一、是口头的暴露，①普通言论（如上面所说的对当权人物李鸿章、载湉的谈话。）②演说（如康有为自订年谱说：戊戌三月二十二日，开保国会于粤东馆，士夫集者数百，投筹公举演说，举吾登座，楼上下皆满，听者有泣下者。这是从来所没有的。）
- 二、是书面的暴露，如上书等等。
- 三、是报章的暴露，中国最早的报纸，当数一八九五年梁启超等在北京所发行鼓吹变法的《中外公报》。这也是从来所没有的。

后来他们又依靠王权，奖励臣民上书，康有为在一八八八年，第一次上书载湉，在说“变成法”后，就提出“通下情，通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阶，使下臣得尽其言于前。”这是请求奖励暴露的第一次；其后又请准许臣民上书，此为第二次。

(康谱说：又令各直省道府自行递折，各州县交督抚代递，上谕谓藉觇中国人之才识，自是我请臣民上书之说乃始行。)不久载湉屡次下谕鼓励士民上书，给以种种便利。告诫他的手下，“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如有阻格情事，就治以应得之罪。(以上据《德宗实录》。)梁氏《戊戌政变记》的上谕跋说：“于是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每日每署，封奏皆数十，……又从前仪式最严，一笔违误，即至议处，至是下僚寒士，皆不谙奏折格式，随手写折，……种种新式，杂沓可笑；至有野人渔民上书，纸有二尺长条，由外省封寄，交都察院代递，直达御前。”载湉又鼓励办报，上谕说：“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直昌言，不必意存忌讳。”(见戊戌六月初八日上谕。)

这种风气一开，从前在封建反动威力压制下社会公众历久郁抑的愤恨就同火山爆发一样，任何力量都不能遏止，从此清王朝的纸糊架子，就开始被灼得体无完肤，它们所相依为命的旧制度，也烧得百孔千疮，而无法作为靠山了。假使这个运动能够成功的话，或者还能作为暂时的续命汤，但是这个运动，很快地给旧势力所摧残和埋葬。以前有一部分人或者对这纸糊架子，还寄以万一的幻想，到了这时，除了失望和愤怒以外，还有什么呢？这种愤怒汇成了洪流，更激起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怒潮，于是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这样说来，改良主义者的变法运动，虽然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生命，但它除了以自己的失败对清王朝作了最大的暴露而外，它的提倡暴露，鼓吹维新，对反动王朝和旧制度的攻击，对于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也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的。而其中最善于暴露的，要算这个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梁启超了。后来有个也参加过变法运动的严复说：

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非他，康梁也。……任公

自窜身海外以来，常以摧剥征伐政府为唯一之能事，《清议》、《新民》、《国风》进而弥厉，至于其极，诋之为穷凶极恶，意若不共戴天，以一己之新学，略有所知，遂若旧制一无可恕。……天下愤兴，流氓童驳，尽可奉辞与之为难。（见《学衡杂志》第八期严氏与熊纯如书札节抄第十八。）

严复的话，当然是意别有在，即以“摧剥征伐”而论，也嫌过于夸大。“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自是辛亥革命，而决不是康梁的言论。但也可以看出当时上层知识分子对他暴露力的重视了。现在为了纪念戊戌变法的六十年，我承乏编了这部梁氏诗文选注。所选的诗文大部分是环绕这个运动为中心，而且大部分是有暴露性的；其次，比较注意有些进步性和创造性的，但也不一定能完全符合这个标准。现在分别介绍一下他的简要历史；他的参加戊戌变法的经过和变法失败后的斗争情形；及他的写作大概。

—

梁氏是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人，名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任父，后又改任公，又号沧江、哀时客、少年中国之少年、新民子、（严复称他为新明，大约即新民的谐音。）饮冰室主人等。逃亡日本时，改名吉田晋，大约正在歆慕吉田矩方之为人，所以用了此姓。他生的一年，是师友李端棻四十一岁，黄遵宪三十四岁，康有为十七岁。戊戌六君子可考者，杨深秀二十五岁，刘光第十七岁，谭嗣同九岁，林旭后一年生。弟子蔡锷后八年生。在历史上有关系者，则如孙中山先生时年八岁，窃国奸雄袁世凯十五岁。他的上半段历史，有《三十自述》一篇，是仿照他的同志谭嗣同《三十自纪》而作的。现在择要记一些在下面，着重他的学

问、思想、办报、讲学和参加变法运动等各方面。自述说：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案癸酉为清同治十二年，即公历 1873 年 2 月 23 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四五岁，就王父(案王父就是祖父，名维清。其先十世为农，至维清始仕为教谕。见梁氏所为其父哀启)及母(案姓赵)膝下，授四子书、《诗经》。……王父……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案名宝瑛)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者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十三岁，始知有段(案指金坛段玉裁)王(案指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十五岁，母赵恭人见背，……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案梁氏弟启勋《曼殊室戊辰笔记》说：“十六岁入学海堂为正班生。”则此年尚非正式生。又说：“同时又为菊坡、粤秀、粤华之院外生。”菊坡等也是书院名，可见梁氏当时求知欲之高。)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

己丑，(案为光绪十五年，公历 1889 年)年十七，举于乡(案就是考中举人。列第八名)，榜主考为李尚书端棻……。年十八，计偕入京师，……李公以其妹许字焉。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案陈通甫名千秋，又字礼吉，南海人）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案康有为自订年谱说：“光绪十六年八月，梁启超来学。”）……先生乃教以陆（案指宋代的陆九渊）王（案指明代的王守仁）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此始。

辛卯，（案为光绪十七年，公历 1891 年）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为讲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案康有为自订年谱：“光绪十二年，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又：“光绪十三年，是岁编人类公理，作内外篇。”当即这里所说的《公理通》。）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先生著《新学伪经考》，从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从事分纂。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而草堂颇有藏书，得恣涉猎，学稍进矣。其年始交康幼博。（案幼博是康广仁的字）十月，入京师，结婚李氏。

壬辰，（案为光绪十八年，公历 1892 年）年二十。王父弃养。（案梁氏上一年入京师就婚，下一年应会试。《曼殊室戊辰笔记》说：“春闱乃李慈园为总裁，欲通一关节，伯兄（梁氏）却之。”时李端棻任会试副总裁，见梁氏《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此事当确。）自是学于草堂者凡三年。（案《戊辰笔记》说：“是年夏南归，乡居一年有奇。”又说：“癸巳冬，讲学于东

莞。”则三年之说，也大略言之。笔记又说：“斯时于国学书籍而外，更购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及各星轺日记，与英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等书。”可以看出他学问的转变。)

甲午，(案为光绪二十年，公历 1894 年)年二十二。客京师。……六月，日本战争起，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益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

乙未，(案为光绪二十一年，公历 1895 年)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其年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之者为南海先生，赞之者为郎中陈炽、郎中沈曾植、编修张孝谦、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为言官所劾，会封禁，而余居会所数月。……其年，始交谭复生、(案即谭嗣同)杨叔峤(案叔峤为杨锐的字)……

京师之开强学会也，上海亦踵起，京师会禁，上海会亦废，而黄公度(案公度是黄遵宪的字)倡议续其馀绪，开一报馆，以书见招。

丙申，(案原文没有说出年份，那末下面的“三月”好像还属于上一年，使人弄不明白，今补)三月去京师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时务报》开，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此始。……时谭复生宦隐金陵，阅月至上海，相过从，连舆接席。复生著《仁学》，每成一篇，辄相商榷，相与治佛学。……十月，湖南陈中丞宝箴、江督学标，聘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就之。时公度官湖南按察使，复生亦归湘助乡治，湘中同志称极盛。未几，德国割据胶州湾事起，瓜分之忧，震动全国，而湖南始创南学会，将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余颇有所贊画，而时务学堂于精神教育亦三致意焉。其年始交

刘裴村、(案裴村是刘光第的字)林瞰谷、(案瞰谷是林旭的字)唐榘丞。(案榘丞是唐才常的字)

戊戌,(案为光绪二十四年,公历 1898 年)年二十六。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既痊,乃入京师。南海先生方开保国会,余多所赞画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荐,总理衙门再荐,被召见,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时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听谏行,复生、瞰谷、叔峤、裴村以京卿参预新政,余亦从诸君子之后,黾勉尽瘁。八月,政变,(案西太后那拉氏反对变法,维新派希望用一个军阀袁世凯的兵力,保护变法,并打击顽固派。但袁世凯竟向顽固派告密,出卖了维新派。下面诗文注释中有详细说明)六君子为国流血;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去国以来,忽忽四年矣。戊戌九月至日本。(案梁氏和康有为逃亡日本后,孙中山曾拟与商谈合作方法,相传康初以“保皇”身分,不愿和革命党交谈;继又坚持孙中山必须执弟子礼,方能相见;最后派梁氏为代表,与中山会晤,但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

己亥(案为光绪二十五年,公历 1899 年)七月,复与滨人共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以为内地留学生预备科之用,即今之清华学校是也。其年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国维新会之设,……冬间招往游,应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岛,其地华商二万馀人相熟留,因暂住焉,创夏威夷维新会。(案本年夏,梁氏又与孙中山商谈合作问题,这时康有为已离开日本遨游欧美去了。据说这次会谈,谈得很具体,梁氏并有合作到底、至死不渝的誓言。当他赴夏威夷时,取得孙中山的介绍信,和地的兴中会会长谈,但结果不是协商合作,